



JICS

Journal of Integrated Cultural Studies

JICS Vol. 1, No. 1, 2026, pp.162-171.

Print ISSN: 3105-840X; Online ISSN: 3105-8418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ic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ICS.26.1.15>



论葛亮小说中物的流动

许永宁 (Xu Yongning) , 刘文萱 (Liu Wenxuan)

摘要: 随着哲学领域对物的讨论的深入, 物的本体地位日益受到关注。这推动了葛亮小说中物的研究从幕后走向台前, 并呈现出显著的“流动性”特征。具体而言, 这种流动性体现为时间的绵延、区域的移动和意义的重构。作家通过写物在主体间的流转, 构建了一种以物为纽带的微观史学, 附着在物身上的个体记忆的叠加、交织与冲突凸显出社会历史的丰富与驳杂; 写物的跨地域流动, 以物在不同地域文化语境中的碰撞、容纳、调适, 隐喻个体文化身份的混杂与调和; 通过相似、创造、占有三条途径, 流动物成为人的物质延伸, 具备了建构主体和推动叙事的能动性。在鲍曼所揭示的充满不确定性、无知感与无力感的现代社会中, 葛亮笔下的物既以其流动映照出时代的变化, 又以其持久性和能动性为焦虑不安的现代人提供了稳定感与理性参照。

关键词: 葛亮; 物; 流动性; 微观史学; 身份调和

作者简介: 许永宁 (通讯作者), 讲师,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研究方向: 中国新诗、中国近现代文学学术史。电邮: xu_yongning@126.com。刘文萱, 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电邮: 749579304@qq.com。

Title: On the Flow of Thing in Ge Liang Novels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discussion on thing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the ontological status of thing is attract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This has promoted the study of thing in Ge Liang's fiction from being behind the scenes to the forefront,

Received: 28 Nov. 2025 / Revised: 29 Nov. 2025 / Accepted: 02 Apr. 2026 / Published online: 30 Apr. 2026 /
Print published: 30 May 2026.

present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a notable “fluidity”. Specifically, this fluidity is embodied in the extension of time, the movement of the region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meaning. By tracing the circulation of thing among subjects, Ge constructs a micro-history with thing as the bond, where the superposition, interweaving, and conflict of individual memories attached to thing give prominence to the richness and complexity of social history. Furthermore, his depiction of the cross-regional flow of thing, through its collision, toleration, and adaptation within different regional cultural contexts, serves as a metaphor for the blending and negotiation of individual cultural identities. Through the three pathways of similarity, creation, and possession, fluid thing becomes a material extension of human beings, endowed with the initiative to construct subjects and promote narratives. In modern society as Zygmunt Bauman reveals, which is filled with uncertainty, ignorance, and powerlessness, the thing in Ge Liang's works not only reflects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through its fluidity, but also provides a sense of stability and rational reference for anxious and restless modern people through its persistence and initiative.

Keywords: Ge Liang; Thing; Fluidity; Microhistory; Identity Reconciliation

Author Biography: **Xu Yongning** (corresponding author), Lecturer,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odern Chinese Poetry, Academic Histor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xu_yongning@126.com. **Liu Wenxuan**, Master's Student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749579304@qq.com.

新世纪以来小说中对“物”的关注成为文学书写的一大亮点，文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明显的“物转向”理论批评。其中葛亮小说以大量物的铺叙和描写成为关注的重点，彰显自身艺术特性的同时，也促动物的精神流转。既往对葛亮小说的研究主要从饮食文化、匠人技艺、抒情考古学等角度切入，探究小说中“物”的意象及其思想资源，不同程度上对物与人关系的研究有所推动。但与此同时，这些研究多从静态视角观察物，且多局限于单部作品，对物自身的能动性、与流动状态的关注尚存不足，留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在此基础上，哲学领域“客体转向”观念的热议，为重新考察葛亮小说中物的流动提供了理论参照。从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2018, p.196) 对物“居留四重整体”的思考，到拉图尔 (Bruno Latour, 2010, p.103) 对“像自然一样真实、像话语一样被表述、像社会一样具有集体性、像存在一样存在”的拟客体的阐发，再到哈曼 (Graham Harman, 2020, p.257) “所有关系都是平等的”的论述等等，哲学层面的这些讨论打破了传统的主客二分，推动物从人类主体的掌控下解放出来，从而与人互为客体。基于此认识，对葛亮小说中物的研究可以超越传统叙事框架，关注物自身的存在方式及其能动性。

纵观葛亮的小说创作史，他对物的指涉经历了从侧重叙事效用到聚焦文化底蕴的转向。在《无岸之河》《阿霞》《老陶》《龙舟》等早期作品中，物开始参与小说叙事，但叙述重点在物之外，葛亮仅寥寥数笔勾勒物的局部特点，或以丰满人物形象，或以渲染小说氛围……

物的主体性并未凸显。随着葛亮创作实践的不断深入,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续关注,葛亮将视野投向更广阔的社会历史空间,物在小说中占据的篇幅逐渐增多,其所蕴含的文化生命力日益强劲。物也就不再是被动的客体,而主动地参与历史记忆、社会关系与文化认同的建构。面对现代性流动带来的焦虑与不安,葛亮正是通过对物极富张力的书写,在为物人关系的重新构建提供新的文学路径的同时,也为漂泊的灵魂寻得一处能安放记忆和情感的“栖息地”。

一、物的历史流动与微观建构

葛亮的几部长篇小说,虽以宏大历史作为潜在背景,但葛亮对其少有全景式的铺展详叙,而是试图“以显微镜而非望远镜的方式”,聚焦日常之物,构建一种微观史学。这种微观史学强调对具体的物进行深入的历史考察,通过揭示历史碎片本身以呈现社会历史的复杂面向。正如“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看似不起眼的物,其背后通常隐藏着“远远超出其本身的深层结构、广阔的历史语境,以及宏大历史目标”(邓京力,2016)。因此,葛亮让物主动地参与历史叙述,以钩沉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个体与集体记忆。在时间的流动中,物不断承载个体的记忆与情感,而个体记忆的叠加、交织与冲突最终凸显出社会历史的丰富与驳杂。

首先,作为个体生命的亲历者,物储存了个体过往记忆和情感,其流动与再现表征着个体回忆进程的持续延展,根本上则指涉“我之为我”的自我定位。葛亮的小说几乎随处可见记忆之物,如《37 楼爱情遗事》的胡桃木书架是“他”和“她”交往的见证,《飞发》的“孖人牌”剃刀记录了翟玉成孔雀时期的辉煌,《英珠》中巴朗山的明信片则是“我”六年前四川之行的纪念品。相较于“半张纸条”呈现出的概括性语义记忆模式,葛亮小说中的“物”更多地扮演着历史参与者的角色,它们在与发生高度关联的场域中,直接地参与记忆的构造。在《灵隐》中,荡漾着素馨花香的景泰蓝香盒是袁美珍母亲的遗物和常用物,它在小说中反复出现,不断唤醒袁美珍“留存在心理深处和下意识中的关于过去的体验和经验的断片”(吴晓东,2017, p.50)。值得注意的是,它所唤醒的并非客观的、完整的过去,而是经主体筛选,甚至重构的记忆片段。香盒超越了单纯的记忆载体,作为主动的叙事者,协助袁美珍完成对过去的温情重构。在对香盒的展览中,袁美珍试图定格母亲“眼里含笑,有主张”的形象,而母亲的精神病史、用丝袜自杀的结局则在记忆的反复叙事中被有意地回避、掩盖与遗忘。赵静蓉(2005)认为,“我们所拥有的也只是回忆中的过去或想象中的过去。而在被想象连缀起来的回忆中,想象几乎僭越了纯粹事实性的回忆,上升到创造和建构的境界。”从过往语境存续至今的香盒,为袁美珍想象化的现实提供了坚实的物质证明,帮助她确证形塑的记忆的可靠与真实。这种真实性最终为她构筑起稳定、完满、统一的个体经验世界,使其获得不可或缺的尊严感、安全感与生命意义。

其次,物的流动性使得它能够跨越单一主体的界限,串联起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从而勾勒出群体记忆谱系,并最终丰厚了物自身所承载的意蕴内涵。作为存在的实体,物在被出售、赠送、交换、继承的过程中能够和各个群体产生联系,其指涉的空间因而并不局限于一个人的活动范围,而可以无限扩张延伸。譬如《燕食记》中的莲蓉月饼串联起叶七、阿响与五举这三代师徒的人生经历与技艺传承,《北鸢》中的文笙、仁桢、雅各等人因风筝相识、相交与相知,《灵隐》中的《论语》则是明香对金秀承诺的迭代延续,人物之间交往的密度和深度藉此得以显现。以《朱雀》为例具体分析,朱雀吊坠从叶毓芝到楚楚、一纬再到程因、许廷迈的流动轨迹,清晰地勾勒出家族三代人的情缘与血缘的关系网络。因此,朱雀吊坠的功能近似于“活动的族谱”,连缀起家族谱系脉络,使小说中的人物能够对自身的血缘、亲缘关系有所确认和追溯。楚楚、程因对家族历史的逐步明晰,事实上正是每一代人对与朱雀

吊坠相关的人和事的记忆叙述拼凑而成的结果。在代际传递过程中，物不断融入人的主体情感与家族命运，最终丰满了其作为记忆凝聚物的内涵所指，并在文本中得到固定。雷·韦勒克 (René Wellek)、奥·沃伦 (Austin Warren, 1984, p.204) 曾指出，“一个‘意象’可以被转换成隐喻一次，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在小说中，继承朱雀吊坠的每一代女性，在性情上都具有与朱雀神鸟相似的特征——热情、坚韧，敢于反叛社会的规训。叶毓芝不顾父亲反对执意与日本人芥川相爱，在战乱中生下两人爱情的结晶；楚楚与一纬分离二十年，却仍未磨灭浓烈的爱情火焰，她执意在中年生下与他的孩子；程因与泰勒、雅可、许廷迈的情感纠葛，也全在于她的心念意动，率性而为。不在意世俗的是非对错，仅凭一腔赤忱的爱意与生命本能，她们便选择执着到底，如同朱雀身覆火焰，至死而不灭。正是在三代女性对爱情的执着与践行中，“神鸟朱雀”所蕴藉的内涵不断强化，最终成为热情浪漫的南京儿女们的本命所在。

最后，除了承载个体与群体记忆，物因其物质稳定性和“对复杂的社会信息的符号性指称的能力” (阿尔君·阿帕杜莱, 2008, p.41)，得以穿越历史的尘屑，折射出广阔的社会历史变迁。葛亮 (2024) 在采访中曾谈到一个细节，“写《北鸢》时对我近百岁的祖辈有过直接的访谈，老人家谈到一些具体的事件，他今天和明天说的很有可能是不一样的，他的记忆在不同场景下有颠倒重复甚至自我推翻。”这确证了历史的模糊性与不可复原性。由于个体视野的局限、记忆编码的选择性加工等等，即便是归为正史的叙述，也绝非真实情景的完整再现。因此，葛亮放弃以非虚构文体直接记录历史，而尝试以聚焦于物的“小历史”编写进入宏大的历史场域。一方面，葛亮的“格物”之效赋予物细节上的真实，从而支撑了历史叙述的可信度。例如，葛亮参照《南鹞北鸢考工志》记载的制风筝之法，赋予了龙师傅作为扎风筝匠人的身份标识（《北鸢》）；翟玉成飞发铺门口的三色灯柱，葛亮在文中饶有兴致地溯源至中世纪的欧洲（《飞发》）；月傅与陈赫明制作的“梅花脯”，其方法出自宋人林洪所著的《山家清供》（《燕食记》）。葛亮对物的铺叙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建立在对历史信息的大量查考上，这些真实细节的丰富确证了人物身份，进而构筑起以人为单位的历史真实。

另一方面，物凭借物质稳定性能够跨越时间长河，在时间的绵延中，物自身功能与形态的变迁是社会历史具体而微的显现。相比人肉体的易逝与记忆的易混，物具有更强的稳定性与持久性，能经历时间的考验，长久存续在历史长河之中。正如葛亮 (2021, 扉页) 在《瓦猫》首页引用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 (Wisława Szymborska) 的诗句所言：“金属，陶器，鸟的羽毛/无声地庆祝自己战胜了时间。”这些战胜了时间的物，其功能、形态、材质等会随历史进程的展开发生流变，而具有铭刻复杂的社会历史信息的功能。在《燕食记》中，葛亮通过食材的奢侈与简陋的变化映射出民国时期岭南社会的剧烈动荡。起初月傅所做的“溶金煮玉”乃是用的新收的竹溪贡米、白云山上的日息泉水、揭东埔田的“岭南笋”，食材的精细、新鲜与民国时官僚政客多聚集于广州尼庵，大开师姑厅，庵内获资丰富有关。而后日本大举侵占广州，时局动荡，阿响为堃少爷所做暖粥的食材，也就不过是厨房不知何时用剩的冬笋。在《北鸢》中，葛亮则将纸鸢的功能转换与国家命运转折切合。纸鸢从民间玩乐之物，转变为战争时期的通讯信号，再到和平年代的情感寄托，各历史阶段的功能恰好对应国家从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生存状况。物的流动与演变，本身就成为一部微缩的社会史。在这种互文观照下，小历史得以自然地嵌入大历史的语境，大历史的变迁也在物的细枝末节中得到了隐晦而真切的呈现。

如浸染了多年烟火气、漾有褶皱的昭君画像，物身上既有着历史的纵深感，又因稳定的物质属性得以流传至今。因此，物能够在流动中创造统一和连续的历史景象，帮助个体克服

现代性流动所带来的无序与变化，使个体获得心理的归趋和稳定。正如葛亮在采访中所言：“一旦没有了历史感，每个人都会感到彷徨，每个个体也无法体会到自身的意义所在，作为一个写作者，重塑历史最终是为了帮助每一个个体寻找自我的文化身份。”¹。无论是对个体记忆的打捞，还是追溯家族血脉的来源，抑或是对时代历史进行回顾，小说中的物和“讲故事的人”一样发挥着主体性。它们“天然不具备心理层面的意图”（周莉莉，颜倩，2025），而能以松散闲置的日常状态，在不经意间触发历史图景的显现；个体在物的直观呈现中回望历史，从而得以确认“我之为我”的命途所在。

二、物的跨域流动与身份调和

全球化背景下，小说中的物不仅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浮，也随着人的迁移发生地域的移动，从而展开文化间的对话交流。流动伊始，作为地域文化的物质载体，物具有鲜明的“在地性”特质。原地域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影响、塑造着物最初的功能及形态。通过强调物所承载的地理和人文内涵，葛亮使物成为具象化的“地方志”。一方面，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物产资源，构成了物的物质基础。在小说中，葛亮强调了这种“本土化”的物质材料，并将其作为“地道”与否的衡量标准。对于《灵隐》中的连阿嬷来说，不同的地域的食材有着不同的风味。她偏好“生记”虾酱，一个重要因素便是他们家用的是本地银虾。而《燕食记》中的戴明义，能就着上海的海蜇头享受一碗清粥，却不喜香港南北货行出售的海蜇头，关键也在于“地道”二字。一方水土养一方物，地理环境作为地域的物质根基，不仅孕育了当地物产，更让物产从根源上容纳了土地的基因。另一方面，地方性的文化观念、信仰与传说从内部塑造了物的形态和功能，物“不但象征了各种文化观念和成就，而且也是各种文化观念和成就的具体体现。”（Arthur Asa Berger, 2016, p.17）《瓦猫》中昆明龙泉的瓦猫“身量小，但样子极凶。凸眼暴睛，两爪间执一阴阳八卦，口大如斗，满嘴利牙，像要吞吐乾坤的样子”（葛亮，2021，p.224），这一凶煞的模样源自昆明民间将其视为辟邪消灾、吞噬鬼魅、震慑游魂的镇宅兽的文化心理。在神荼郁垒执鬼以饲虎这一民间传说中，虎被认为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而瓦猫原义正是能食鬼的老虎，其原型参照虎的形态，从而存有“猫容虎劲”之意。瓦猫在此不是孤零零的器物，而是地方性知识的物质结晶。因此，葛亮小说中的物，在开始流动前，便不是单纯的客体，而是植入了原地域文化基因的符号所在。五举所说的“一菜一系，根基是不能动的”（葛亮，2022，p.492），强调的正是地域地理与人文共同熔铸形成的物的文化标识。

当物跟随着人的迁移，进入新的文化场域，物所携带的原乡编码得以进一步凸显。在单一的地域空间中，一切皆自然流淌，物的特质往往习焉不察，以为是寻常景象，不觉有何特殊。直到进入新的文化语境中，此城的文化与原乡的文化发生诸多因素的对立冲突，地域文化中“稳定、不变与持续的意义架构”才变得格外清晰。在《瓦猫》中，荣瑞红从小便由爷爷带领去周边看别人家的瓦猫，要看的，自然是自家与别家的不同。“看多了，看久了，便越发守住了自家龙泉瓦猫不变的根本。”（葛亮，2021，p.258）流动不仅没有消弭物的原乡特质，反而促成了对自身文化内核的确认。与此同时，原乡特质的保留使得物能够唤醒异乡漂泊者的地方记忆，慰藉他们的乡愁。在《燕食记》中，明义南下随身携带的老糟卤作为烹调本帮菜糟钵头的原料，蕴藏着文化记忆的象征介质。老糟卤味的“结棍”，加之三林本帮菜的老方法，悄然唤醒了流落香港的“老克腊”“麻甩佬”关于上海的原乡记忆，传达着斯人对故乡“爱与依恋”的情感。通过复现本帮菜的纯正风味，明义在异乡构筑了一个味觉上的乡地，满足了离人对故乡的想象与感怀。

¹ 吕楠芳（2022-9-11）：“葛亮：粤语，让小说表达更加‘爽’”，《羊城晚报》，A6。

然而，小说中“温莎”飞发铺的关张，老字号“奇芳阁”一楼铺面被迫出租给麦当劳等现象，暗示着固守一处的徒然与求变的必然。物在与新的地域文化接触的过程中，不断容纳新变。正如《物的帝国》导论中，弗雷德·R·迈尔斯 (Fred R. Myers, 2001, p.11) 所指出的那样，物在文化上不是固定的，它总是处于存在和形成的过程中，“移动、不稳定、动态是物的社会生命过程中的显然特征”。无论是《灵隐》中的观音像，抑或是《燕食记》中的莲蓉月饼，它们的文化意涵并非固着在某一处，恰恰相反，随着空间的不断延伸，这些文化符号也由封闭走向开放。这种开放在小说中表现为无拘的变与有限的变两种形态，以“鸳鸯”饮品和“鸳鸯”月饼为代表（《燕食记》）。前者是大排档西茶档的发明，是咖啡、红茶与淡奶的混合。它意味着来者不拒的无矩融合。如所谓的“京川沪”新式餐厅，“原本水火难容的口味，看似被调和鼎鼐，可也因此多了迁就与混杂。”（葛亮，2022，p.508）一味地追求新变，使得物失去了文化的重心与内核，最终成为令人心生嫌隙的“四不像”。它所隐喻的是在文化冲击中失去方向的身份状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鸳鸯”月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黑芝麻与奶黄流心两种馅料，经由薄薄的一片豆腐片既能“包容相照”，又能“壁垒分明”，不至于融化成一团而失去各自本味。这一调和的本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的一方迁就，也不是失去内核的混杂，而是在差异中并存。在尊重各自特质的前提下，兼取众长而又超越两者，最终达到一种新的澄明状态。

物的流动，本质上隐喻了人的文化身份的重构。葛亮的小说多涉及异乡之人，如从苏格兰到南京留学的许廷迈，自福建到香港谋生的连阿嬷，由青岛到襄城潜伏的逸美等等，他们怀揣不同的目的来到他乡，并深深地扎根于此，了解此地的文化与传统。而本土者，则会在接触异乡人的过程中，与异域文化对话并受到影响。随着时间的持续与了解的深入，他们的文化身份也在发生转变。这种演变往往与物的运动轨迹呼应，这意味着“运动中的物说明了人以及社会的内涵”（阿尔君·阿帕杜莱，2008，p.13）。《燕食记》中的五举，虽为香港土著，却不折不扣是文化意味上的流散者。他先是跟随荣师傅继承广式糕点技艺，后又因入赘戴家而深耕本帮菜，并在时代的推动下创造出粤沪合璧的新式菜品。两种菜系的结合在内里隐喻着五举双重身份的嫁接。与荣师傅对“粤点师傅”这一身份的界定、固守不同，五举并不认为二者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相反，他在饮食的创新实践中坦然承认了这两种身份的混杂，并将自我的文化身份进一步外扩与重构。如果说“水晶生煎”是为化解邵公故旧“刁难”的被迫之举，那么让“十八行”不同俗流的“黄玉烧卖”“叉烧蟹壳黄”等粤沪结合菜品，则是五举闲情之下的主动探索。及至点心“太极”的创制，五举彻底打破了曾经束缚手脚的禁忌，不再局限于粤沪两地的文化身份，而能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吸纳新的文化。

文化的产物往往具有复刻性，只要技艺还在，物便能突破地域和时间不断存续。葛亮正是利用这样一种复刻性，实现了特定地域之物在另一地域的呈现。在这一过程中，物保留了原地域的特性风貌，能够瞬间唤起外乡人对家乡的深切感触。但是，物绝非一成不变的静态文化载体，它天然地具有地域适应性，会被新的空间所影响，这与人的文化身份总在他乡与此在摇摆的特点相契合。在全球化流动的大趋势下，“身份更象是火山熔岩顶部上一再被固化的表层部位，在它有时间冷却和固定下来前就再度被熔化”（齐格蒙特·鲍曼，2002，p.127）。固守一处几乎成为现代人的妄想，对身份的追寻成为一种持续性的斗争。与人类形成观照的物则以近于隐喻的方式暗示重要的不是对某一身份的选择，而是要既保有不同地域文化的特色，各文化身份又能各安其所，圆融统一。

三、流动物与人的物质延伸

流动下的物之所以能够承载丰富的历史与文化意涵，根本在于“物人混融”的叙事实践，

即“人们将灵魂融于事物，亦将事物融于灵魂”（马塞尔·莫斯，2017，p.40）。在小说中，葛亮通过相似、创造、占有等多途径模糊了主客体之间的界限，使无生命的物成为包含“主体意识和无生命客体的复合自我”（韩启群，2017），并进一步表现为人的物质延伸。一方面，物在被使用、触摸、凝视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人的情感色彩，成为人情感世界的外在参照物。另一方面，物具有自主性和生命力，能够积极主动参与到移情活动中来，并驱动人的主体行动。

其一，物被赋予与人类主体相似的特征，这种相似性使这些物超脱其物质的本真，进而作为人的镜像存在。这一相似并不粗浅地表现为外观上的相像，如临摹般追求形像，而更多地指涉性格特征、精神气质的相似相通。如《北鸢》中家睦为文笙制作的虎头风筝，因工艺上的稚嫩，有着照猫画虎般模仿虎之形态的稚拙。这种稚拙被龙宝直接点明：“老虎若是不吃人，只顾上睡觉，便也是一只猫；猫要是急了，厉形厉色，毛竖起来，凶得也像只老虎。”（葛亮，2016，p.155）猫与虎之间的互相转化与文笙的性格特质相呼应，他看似温煦平和，实则内心笃定、富有想法。小说中，虎头风筝数次出现，在猫与虎的姿态间奔腾旋转，其形态的“流动”便隐喻着卢文笙性格的不同侧面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渐次凸显与最终完成，而其性格也未脱离猫、虎范畴。至于罐子之于小易（《罐子》）、龙舟之于于野（《龙舟》）、鹌鹑之于露姨（《鹌鹑》），亦是精气相通、物我相似，从而达到以物代我的叙事效果。如果说以上这些物人相似是作家在读者层面架构的联系，那么在《灵隐》一书中，庆师傅则在文本内部给观音像移入了人的“幽灵”，使物成为干预主体精神的能动者。在一开始，连思睿递给段河的观音像为碎裂的德化瓷制的水月观音，庆师傅在制作过程中摒弃了象征虚幻与过渡的水月观音形象，选择了代表实相与救赎的滴水观音，暗含对连思睿破执的愿景。而破执目的的达成，在于庆师傅参照林昭的神态，用柚木刻画出了富有活气的面容，使观音像成为林昭的具象存在。这个被刻意植入“人的形象”的物，不再是纯粹的摆件，而成为主动干预人的精神世界的叙事能动者，促动连思睿在林昭的精神内核中观照自身。

其二，小说中的人通过造物，将自我的一部分让渡给物件。在造物的过程中，他们投入了大量的“心智能量”，即劳动、时间和精力等。由于这种能量及其产品“从自我的身上长大或成型”（罗素·W.贝尔克，2008，p.121），因而被视为自我的一部分，物也就成为人的物质延伸。一方面，葛亮通过深描造物工序的繁复，展现人在造物中的精力耗损。如《灵隐》中，造佛像需经过“选材”“取木”“开气”“去大柴”“修光”“打磨”“做底”等多道工序，前后历时长达数十年。不仅时间长程序多，造物的背后还埋藏着造物者经年累月的“熬”的训练。光“做底”这一道工艺，段河就学了五年。而《燕食记》中五举在正式学做莲蓉月饼前，经过了焗酥皮、“炸芋虾”的训练，人直瘦到销骨脱形，生生被熬干。另一方面，物的创造不是机械式的重复，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审美驱动。《飞发》中翟康然所欣赏的渐变式飞青与翟师傅将两鬓剃得干干净净举动体现出不同的审美倾向，前者注意结构、轮廓、光泽，讲究灰度的美学呈现，后者则偏向清爽利落。《灵隐》中林昭所绘的油画女人，则更近乎“真的我”的理念投射。面对苦心孤诣造就的物，小说中的人表现为一种惜物的情状，且无法容忍他人的干涉。在看到费去很多时间修剪的灰度被父亲染指后，翟康然深感不满，因为这是对其审美观念的否定。因此，重新修剪时，翟康然面色更显严肃，且一言不发，全身心投入到对自身造物的捍卫。

其三，葛亮在小说中强调了物的被拥有或被占有，这一占有性质并不是物与人的“外在性关系的纯粹外在名称”，而是“深刻地规定了它，向我并向别人显现为是它的存在的部分”（萨特，2007，p.711）。其归属状态因此被拓展为人的符号特征，人的心理状态借由物得以外化显化。《灵隐》中连粤名随身携带的大水壶，其作为盛水容器的实用功能在文本中被

削弱与压抑，而象征意味则被凸显。在人们的认知与情感体系中，它被烙印上连粤名的个人印记，与连粤名“紧密贴合、黏合甚至是融合，成了人物的外延或曰其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傅修延，2021）。因此，任何针对这只水壶所发起的刁难、嘲弄之举，都不仅是面向一个无生命物体，其实质上是他人对物的占有者不满与怀疑情绪的一种间接性转移与宣泄。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物-符号”双联体的水壶，脱离了纯然之物的存在，“向纯然符号载体一端靠拢”（赵毅衡，2011），具有表征主体意识的功能。葛亮通过写水壶从被收起来到重新回到讲台这一细微的位置流动，隐微地映射了连粤名从自我怀疑到自我坚定的心理转变轨迹。

在小说中，物的占有很少通过直接的购买行为获得，而是通过继承或赠送等行为在不同主体之间流转。这种赠送与继承，不仅是情感的转移，更是义务、命运或秘密的转移。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认为，物中包含着“hau”——一种灵力，物的交换也就是物的灵力的交换。“在这种观念体系中，所要还给他人的东西，事实上是那个人本性或本质的一部分；因为接受了某人的某物，就是接受了他的某些精神本质，接受了他的一部分灵魂”（马塞尔·莫斯，2017，p.24）。《北鸢》中的玉麒麟、《灵隐》中的“鸳鸯戏水”拖鞋等物的每一次易主，都预示着人际关系或人物命运的陡然转折。接受这样的物，意味着接受了赠与者的一部分生命故事，必须做出自己的回应。这种基于物的交感与互渗，构成了小说中一种潜在的、驱动情节的神秘力量，物成为引发后续一系列行为的直接动因。如《北鸢》中，玉麒麟指向命运的轮回与重复，它让言秋凤知晓蛮蛮的真实身份，并继承遗志刺杀和田，走向和蛮蛮相同的结局。而《燕食记》中的一块手工月饼，则让叶七和阿响命运纠缠。叶七的匠心与救国使命正是经由莲蓉月饼的技艺传递，在阿响身上得到延续。葛亮对命运的指涉，因这层物中介，多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宿命感与神秘性。

在小说中，葛亮对人物的情感与心理的展现少有大开大合的极力铺叙，这一方面与他笔下人物性格多缄默、沉稳有关，另一方面也暗合其被称为“老灵魂”的克制、内敛的叙事风格。正因如此，葛亮试图通过物的形态、样式、功能与位置的微妙变动，细腻地折射出人物自我情感与自我意识的流动轨迹。通过相似、创造、占有的途径，葛亮在赋予流动的物以人的生命的同时，也表明人的生命也可以物的方式来表达。这种以物为媒介的情感表达，不仅避免了直白的情感宣泄，也更贴合现代人复杂而隐晦的内心世界。最终，个体在物的变迁中重塑自我认知，实现情感与精神层面的升华与超越。

结语

在一个常被形容为“物欲横流”的消费时代，葛亮的小说将目光聚焦在流动物身上，以灵动的“物叙事”，构建了一种物人混融的物学观。他所描绘的物，并非是商品逻辑下的占有对象，而是个体情感、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凝聚的物质载体。人对物的留恋，也不是贪恋物质的享受与愉悦，其本质上是对附着其上的生命经验与文化根基的坚守。“那个时代走来的人，总是对各种器皿有着不寻常的感情，爱惜甚而眷恋，不忍丢弃。这里头埋藏的东西，怕是也说不清。”（葛亮，2021）葛亮小说写物，其实是将物作为连接此时与彼时的媒介，借之观照历史，从而描绘人情与世情存在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因此，他赋予了物更多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使其呈现出“流动性”特征。在发生时空变化的同时，物也通过改变外观形态、承载功能以适应新的文化界定，从而“渗透着前进”。在“前进”过程中，物不仅参与了个体、家族乃至社会历史的建构，也实现了多元文化身份的混杂与澄明。这不仅丰满了物自体的形象，也重构了物与人之间的关系。二者相互映照、同构共存，具象化的物为流离之人提供了可以触摸的精神慰藉。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世纪“非虚构”写作中的社会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4YBA13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Xu Yongning ^{ID} <https://orcid.org/0009-0006-5220-2554>

Liu Wenxua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8-9200-6691>

References

- 阿尔君·阿帕杜莱 (2008)：“商品与价值的政治”，夏莹译。孟悦，罗钢主编：《物质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2-58。
- [Appadurai, Arjun (2008). “Commod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Value”, translated by Xia Ying. In Meng Yue, Luo Gang (Eds.), *A Reader of Material Cultur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12-58.]
- 齐格蒙特·鲍曼 (2002)：《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
- [Bauman, Zygmunt (2002). *Liquid Modernity*, translated by Ouyang Jinggen.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罗素·W.贝尔克 (2008)：“财产与延伸的自我”，吕迎春译。孟悦，罗钢主编：《物质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12-150。
- [Belk, Russell W. (2008). “Possessions and the Extended Self”, translated by Lv Yingchun. In Meng Yue & Luo Gang (Eds.), *A Reader of Material Cultur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112-150.]
- Berger, Arthur Asa (2016). *What Objects Mean: An Introduction to Material Culture (2nd ed.)*. Routledge.
- 邓京力 (2016)：“微观史学的理论视野”，《天津社会科学》(01)：153-160。
- [Deng Jingli (2016).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Microhistory.” *Tianjin Social Sciences* (01): 153-160. DOI: 10.16240/j.cnki.1002-3976.2016.01.019]
- 傅修延 (2021)：“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物叙事与意义世界的形成”，《天津社会科学》(05)：161-173。
- [Fu Xiuyan (2021). “Literature is ‘Humanities’ and also ‘Thingology’ — Material Narrative and the Formation of a World of Meaning.” *Tianjin Social Sciences* (05): 161-173. DOI: 10.16240/j.cnki.1002-3976.20210513.001]
- Fred R. Myers (2001). “Introduction: The Empire of Things” In Fred Myers (Ed.), *The Empire of Things: Regimes of Value and Material Culture* (pp. 3-61), School for Advanced Research Press.
- 葛亮 (2016)：《北鸢》。人民文学出版社。
- [Ge Liang (2016). *Paper Hawk*.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葛亮 (2021)：《瓦猫》。人民文学出版社。
- [Ge Liang (2021). *Tile Cat*.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葛亮 (2021-02-16)：“物象赋”，<https://moment.rednet.cn/pc/content/2021/02/09/8990956.html>。
- [Ge Liang (2021 Feb 16). “Ode to Material Images”, <https://moment.rednet.cn/pc/content/2021/02/09/8990956.html>.]
- 葛亮 (2022)：《燕食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 [Ge Liang (2022). *Food Is Heaven*.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韩启群 (2017)：“西方文论关键词：物转向”，《外国文学》(06)：88-99。
- [Han Qiqun (2017). “The Material Turn: A Keyword in Critical Theory.” *Foreign Literature* (06): 88-99. DOI: <https://10.16430/j.cnki.fl.2017.06.010>]
- 格拉汉姆·哈曼 (2020)：《迈向思辨实在论：论文与讲座》，花超荣译。长江文艺出版社。
- [Harman, Graham (2020). *Towards Speculative Realism: Essays and Lectures*, translated by Hua Chaorong. Chang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海德格尔 (2018)：《海德格尔文集·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
- [Heidegger, Martin (2018). *Heidegger’s Collected Works: Speeches and Essays*, translated by Sun Zhoux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布鲁诺·拉图尔 (2010)：《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安涅思译。苏州大学出版社。

- [Latour, Bruno (2010).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Essays in Symmetrical Anthropology*, translated by Liu Peng & An Nesi. Suzhou University Press.]
- 马塞尔·莫斯 (2017) : 《礼物: 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 汲喆译。商务印书馆。
- [Mauss, Marcel (2017). *The Gift: 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translated by Ji Zhe. The Commercial Press.]
- 萨特 (2007) : 《存在与虚无》, 陈宜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Sartre, Jean-Paul (2007). *Being and Nothingness*, translated by Chen Yiliang et al.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雷·韦勒克、奥·沃伦 (1984) : 《文学理论》, 刘象愚, 邢培明, 陈圣生, 李哲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Wellek, René & Warren, Austin (1984). *Theory of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Liu Xiangyu, Xing Peiming, Chen Shengsheng & Li Zhem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吴晓东 (2017) : “从卡夫卡到昆德拉: 20 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Wu Xiaodong (2017). *From Kafka to Kundera: Novels and Novelists of the 20th Centur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赵静蓉 (2005) : “想象的文化记忆——论怀旧的审美心理”, 《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02) : 54-57。
- [Zhao Jingrong (2005). “Imagined Cultural Memory: On the Aesthetic Psychology of Nostalgia.”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02): 54-57. DOI: <https://10.3969/j.issn.1001-5957.2005.02.012>]
- 赵毅衡 (2011) : “符号与物: ‘人的世界’是如何构成的”, 《南京社会科学》 (02) : 35-42。
- [Zhao Yiheng (2011). “Signs and Things: How is the ‘Human World’ Constituted.” *Nanjing Social Sciences* (02): 35-42. DOI: 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1.02.015]
- 周莉莉、颜倩 (2025) : “物在文学作品中的可塑性——唐伟胜《物性叙事研究》述评”, 《文学写作与评价学刊》 (01) : 155-160。
- [Zhou Lili, Yan Qian (2025). “Telling from Things in Literary Works: A Critique of *Study on Narrative of Thingness*.”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Criticism* (01): 155-160.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5.1.19>]